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德国统一史

第二卷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 (Band 2)

**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冒险之举：
与经济学原理相冲突却迫于形势的政治举措**

*Das Wagnis der Währungs-, Wirtschafts- und Sozialunion:
Politische Zwänge im Konflikt mit ökonomischen Regeln*

[德] 迪特尔·格鲁瑟尔/著
(Dieter Grosser)

邓文子/译

胡琨/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德国统一史

第二卷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 (Band 2)

**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冒险之举：
与经济学原理相冲突却迫于形势的政治举措**

*Das Wagnis der Währungs-, Wirtschafts- und Sozialunion:
Politische Zwänge im Konflikt mit ökonomischen Regeln*

〔德〕迪特尔·格鲁瑟尔/著
(Dieter Grosser)

邓文子/译

胡琨/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统一史. 第2卷, 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冒险之举: 与经济学原理相冲突却迫于形势的政治举措 / (德) 格鲁瑟尔 (Grosser, D.) 著; 邓文子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8442 - 6

I. ①德… II. ①格… ②邓… III. ①德国 - 历史 - 1989 ~ 1990

IV. ①K51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3932 号

·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

德国统一史(第二卷)

——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冒险之举: 与经济学原理相冲突
却迫于形势的政治举措

著 者 / [德] 迪特尔·格鲁瑟尔 (Dieter Grosser)

译 者 / 邓文子

审 校 / 胡 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赵怀英

特邀编辑 / 欧阳甦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9.5 插 页: 1.25 字 数: 648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442 - 6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3 - 266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6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是“德国统一的基石”（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尽管它与经济学原理相违背，但联邦政府还是迈出了这一步。根据那些原理，必须等到民主德国经济生产率逐步达到与西德同等的水平之后，才可实现货币统一以及接踵而来的国家统一。然而，大多数东德人不愿经受如此漫长的等待，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尽快像西德人那样生活。

联邦政府也不愿如此久等。它预计，民主德国难凭一己之力整顿经济；越境人潮还将继续，必须以限制入境（联邦德国）的方式加以制止；德国统一会无限期推迟，或许将永失良机。因此，1990年2月6日，执政党主席兼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联邦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自由民主党（FDP）主席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当机立断，对民主德国提议举行关于“伴随经济共同体的货币联盟”的谈判。

莫德罗（Modrow）政府就立即引进西德马克（D - Mark, DM）做好了思想准备。在1990年3月18日的东德人民议院的选举中，德梅齐埃（de Maizière）民主合法政府获得选民的委托，尽快落实货币、经济和国家统一。民主德国民众知道，他们面临的是“从沉船跳入冷水”[《新德意志报》，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现在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的中央宣传刊物]的局面，而他们也希望，在西德的帮助下，在冷水中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

本卷将尽可能确切地描述当年促成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进而导致德国统一迈出决定性步骤的各种考量和谈判。关于如何应对欧洲共同体（EG）和苏联，以确保这一步骤的实现，将以德国总理府和联邦财政部的文件为基础，进行详细描绘。

有关1990年以前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形势、莫德罗政府的改

革努力以及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自1989年10月以来所爆发的危机做出的第一反应等章节，是本研究的中心部分。以此可以说明，波恩和东柏林的当权者在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决策过程中的出发点，即各种决策的前提条件。同时，还将对这些决策的后果加以阐述，以便对联邦政府的政策作出评估。

因此，本卷主要聚焦于“经济”和“货币”问题，也就是国家条约、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就规范未决财产问题的“共同声明”（*Gemeinsame Erklärung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er DDR zur Regelung offener Vermögensfragen*——编者注）以及《信托管理法》（*Treuhand - Gesetz*）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至于《统一条约》（*Einigungsvertrag*）中的一些规定，只有当它们在实质性的要点上可以补充说明国家条约中的经济和财政规定时，才被提及。

为撰写本卷的中心内容，我获准使用联邦财政部和联邦总理府尚处于30年保密期内的文件。因此，我要特别感谢联邦总理科尔，经他同意，联邦总理府的文件方可外借。也要感谢联邦财政部长魏格尔，他慷慨而迅速地为我提供了进入该部文献室的机会。还要感谢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汉斯·蒂特梅耶（Hans Tietmeyer），允许我阅览条约草案会谈期间西德代表团团长的文件。

这些文件档案按其成果进行了归档。尽管它们可以与其他部委或谈判对象的文件档案相比较，但只有这些文件，还是无法完全勾勒出想要得到的实际画面。此外，并非所有的西德文献都可供阅览，有些文献只能作为背景资料使用。在查阅档案时，部分东德文件尚未系统存档，尤其是严重缺失德梅齐埃政府的相关文件。不过，权威的当事人和许多官员乐于帮我提供信息并出谋划策，这一点尤为重要。我要特别感谢马蒂亚斯·贝格尔博士（Dr. Mathias Berger）、霍斯特·科勒尔博士（Dr. Horst Köhler）、赫尔穆特·科尔博士、君特·克劳泽教授（Prof. Günther Krause）、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博士、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博士（Dr. Johannes Ludwig）、洛塔尔·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ère）、米夏埃尔·梅尔特斯（Michael Mertes）、理查德·莫齐教授（Prof. Richard Motsch）、赫尔曼-约瑟夫·罗登巴赫博士（Dr. Hermann - Josef Rodenbach）、蒂洛·萨拉辛博士（Dr. Thilo Sarrazin）、瓦尔特·西格尔特博士（Dr. Walter Siegert）、汉斯·蒂特梅耶教授、特奥·魏格尔博士、迪特尔·伏尔岑博士（Dr. Dieter Würzen）提供的宝贵意见。

我的同事乌韦·安德尔森 (Uwe Andersen)、施特凡·比尔林 (Stefan Bierling)、约阿西姆·格劳比茨 (Joachim Glaubitz)、贝阿特·诺伊斯 (Beate Neuss)、彼得·普策尔 (Peter Pulzer)、格哈尔德·里特 (Gehard A. Ritter) 的建议亦不可或缺。

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帮我审阅了大量公开发表的文献，尤其是尤尔克·艾申菲尔德 (Jörg Eschenfelder)、西蒙娜·斯特姆勒 (Simone Stemmler)、约翰内斯·瓦尔贝克 (Johannes Warbeck)、玛雅·采夫斯 (Maja Zehfuß)。

我还要感谢海克·格林博士 (Dr. Heike Grimm)、亚丽桑德拉·格律斯博士 (Dr. Alexandra Größ) 和克里斯蒂安·凯特尔勒 (Christian Ketterle) 在整个项目期间、在解读文献的过程中所给予的学术帮助。

阿曼斯豪森 (Allmannshausen), 1998 年 5 月 1 日

目 录

第一章 重新统一前的民主德国经济	1
第一节 错误的方针：70年代昂纳克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统一”	1
第二节 80年代：困难层出不穷、挽救尝试无济于事	13
第三节 有关最后阶段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局势的数据和结论	25
第四节 制度失灵	42
第二章 虽未战胜挑战但再现辉煌：重新统一前的联邦德国经济	49
第一节 耀眼的基本数据	49
第二节 结构转型	55
第三节 国际竞争尖锐化	58
第四节 不充分的改革	62
第五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误解的理念	67
第三章 风雨飘摇：1989年10月~1990年2月	70
第一节 克伦茨“转折”	72
第二节 莫德罗政府的改革设想	75
第三节 1990年初的经济形势：最糟糕的情况还将来临	98
第四节 从条约共同体到“为了‘德国——统一的祖国’”：11月中旬~次年2月初的两德试探性会谈与立场	101

第四章 提供西德马克	116
第一节 “留在当地的信号”	117
第二节 联邦财政部的前期工作	123
第三节 决定	137
第四节 联邦德国内部的反应	150
第五节 民主德国的反应	158
第六节 莫德罗在波恩	163
第五章 开局对弈	167
第一节 准备“伴随经济共同体的货币联盟”的两德 专家会谈	168
第二节 财产索求与维持财产状况的对立：无休止争端 的开始	182
第三节 滴水不漏的规定与棘手的未决问题：联邦政府的 “初始草案”	192
第四节 蒂特梅耶接管：从“初始草案”到谈判基础	205
第五节 民主德国的最初立场	215
第六章 国家条约	225
第一节 艰难的谈判序幕	225
第二节 初始阶段的冲突与共识	227
第三节 关于货币转换的共识	232
第四节 困难阶段	235
第五节 地方议会选举结果：冲突缓和	238
第六节 被迫达成一致	239
第七节 最后谈判与签署	245
第八节 波恩的摆布？	249
第九节 批准的混乱	252
第十节 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被迫接受考验	262

第十一节 从国家条约到《统一条约》：德梅齐埃政府 逃向统一	264
第七章 紧急方案	268
第一节 在未决财产问题上的妥协	268
第二节 新的托管局	281
第三节 统一的融资	298
第八章 国际顾虑	314
第一节 与欧洲共同体会谈	314
第二节 苏联讨价还价	335
第九章 创造性的破坏	355
第一节 货币转换：经验报告 （阿尔维德·美因茨）	356
第二节 进入新经济制度的艰难开始	367
第三节 新联邦州的经济发展 1991 ~ 1997 年	379
第十章 是非功过	397
第一节 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397
第二节 选择：放弃统一	406
附 录	
注 释	414
资料来源	525
文献资料	527

访 谈	538
各类名称缩写一览表	539
大事年表	543
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准备过程中的德方参与者（挑选）	546
人名索引	551
内容索引	561

第一章 重新统一前的民主德国经济

假如苏联没有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没有进行结构调整，假如昂纳克（Honecker）没有被推翻，而是得到莫斯科的扶持，民主德国将会变成何样？这类问题常常只是引起热闹的猜测。在民主德国事件中，现有资料明确表明，自1988年以来，其经济崩溃的迹象已经显露；即便苏联经济调控体系仍能发挥功能，它也无能为力继续扶持民主德国；民主德国很有可能被迫向联邦德国提出贷款和转移支付的请求，这些请求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一般规模；也不能排除联邦德国为了换取进一步的“人道主义的宽松政策”，才给民主德国提供了可观的资金援助。然而，这些举措或许只能推迟却无法阻止民主德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的政策只是加快了民主德国的崩溃，实际上，这一崩溃是其经济全面失灵的结果，无论莫斯科哪股力量决定苏联共产党（KPdSU）的路线，结局都是一样的。

今天，可以很容易地回顾民主德国处于废墟中的经济发展历程。近来逐渐可以阅读到民主德国党和国家机关的文件，它们所揭示的计划体制的失灵、党领导层的诸多幻觉以及衰败中的束手无策等，远比西方观察家1990年以前所拥有的资料清晰得多。1990年以后，一些在民主德国经济调控系统中身居要职的人士可以接受采访，他们提供的信息也很有启发。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哈尔德·许雷尔（Gerhard Schürer）、“商业协调部门”（Kommerzielle Koordinierung, KoKo）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沙尔克-哥罗德科夫斯基（Alexander Schalck-Golodkowski），或者当年联合企业的厂长们。由于已有大批参考文献，¹这里只着眼于民主德国的基本发展特征和统一社会党的典型决策。

第一节 错误的方针：70年代昂纳克的 “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统一”

昂纳克下台以后，民主德国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表示，灾难始于1971

年昂纳克接管政权及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统一”。1989年11月10日，许雷尔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上解释了民主德国所欠西方债务的原因，他的报告典型地反映了这一观点。许雷尔说：“随着1971年社会政治大纲的实施——（……）它具有如此巨大和积极的作用——当时扳错了方向，尽管只有毫厘之差，但列车从此脱离了现实的轨道，并且越开越快。”²

这符合以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为首的统一社会党新领导层的利益，他们想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昂纳克身上，以便为自己和社会主义制度开脱。对于事态的发展，当然不能如此妄下结论。最迟从1976年起，政治局全体委员就都知道，他们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要求过高，除非出现奇迹，迟早会面临一场灾难。他们也清楚，存在着一种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社会和财政政策，但它可能危及其统治基础。而现实情况偏偏特别令人不快：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产能持续下降，原材料价格上涨，与贸易伙伴苏联之间的困难加大，世界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统一社会党的高层领导尽可能长时间地置现实于不顾，希望出现奇迹。对此，谁会感到惊讶呢？灾难并非始于昂纳克，它和现行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为这种制度阻碍创新，进而阻碍其适应世界经济的转型。然而，领导集团中没有任何一位成员会承认这一点。许雷尔“扳错方向”的定义并非完全离谱。昂纳克的前任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实施了投资和工业基础要优先于个人消费的政策，还严格控制对西方的债务。到了昂纳克手里，物质材料开始耗尽，因为忽视了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与此同时，欠西方的债务却在增加。

1971年昂纳克的转折：权力重新集中和消费许诺

乌布利希生于1893年，自1950年起担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3年起，担任第一书记）。因年龄原因，他最迟必须在70年代中期将权力移交给年轻的一代。但在权力更迭过程出现了激烈的斗争。作为可能的继承人，昂纳克为使自已早日登上权力顶峰，利用了统一社会党部分成员和苏联领导对乌布利希经济政策的日益不满。这种不满有很重要的原因。

1963年，乌布利希宣布了“计划与领导的新经济体制”。他的目标是，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使民主德国经济达到“世界水平”，从而缩小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差距。对此应当采用双重战略。一方面，应该提高生产积

极性和效益。乌布利希决意通过放宽经济调控体系，利用“经济杠杆”和“货币刺激”，如利润、成本、营业额、利率、奖金和价格改革等来调控企业。另一方面，应当首先扩大对未来经济至关重要的工业门类，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则继续通过中央指定计划来调控。属于“决定（经济）结构的重点部门”有：电力、电子工业，机器制造和化工工业。当时，该方案也曾令许多西德观察家振奋。除了确定上述重点部门以外，民主德国至少看似选择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从1967年开始，“计划与领导的新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从未正常运行过。一个原因是，在党和经济调控部门内部，分权和价格改革遭到重重阻力，基本停滞不前。另一个原因是，扩大“重点部门”需要大量资金，满足了它们的需要，其他部门就无法获得资金。给予非集中调控的部门以独立性，足以导致“比例失调”：太多企业转而生产带来销售利润的产品；推迟供应重点部门和出口企业的配件，经济产能不堪重负；如果没有价格绑定，剧烈的通货膨胀在所难免。这表明，一种部分取消中央计划的体制，如果无法代之以有效的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将比深深受到持续性干扰所困的中央调控体制更加脆弱。

除了体制本身导致的固有问题以外，还有对外经济中存在的障碍：民主德国依赖苏联原材料的供应。乌布利希需要更多的石油和钢材，否则他的工业现代化方案根本无法实施。1965年，当苏联拒绝供应更多的石油和轧钢时，支持改革的人士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样一来，他们的整个方案都将面临危险。³苏联从一开始起就不怎么看好乌布利希的改革政策。最初倒不是因为以赫鲁晓夫（Chruschtschow）为首的苏联领导层拒绝对中央调控体制进行任何改革，多年以来，苏联自己也在讨论经济学家利别尔曼（Lieberman）的改革设想。原因在于，苏联更担心的是，乌布利希追求“世界水平”，这迟早会危及民主德国与苏联的经济联系。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国内停止了关于改革的讨论，中央调控体制只发生了少许变化。而乌布利希想把改革方案作为模式展示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倾向日益明显，莫斯科看在眼里，更加不快。它怀疑乌布利希想减少民主德国对苏联的依赖。1970年7月底，乌布利希在莫斯科对勃列日涅夫（Breschnew）说：“我们愿……在（与苏联）真正的合作中，将自身发展成为真正的德意志国家。我们不是白俄罗斯，不是苏维埃国家。要真正的

合作。”此时，这一怀疑似乎得到了印证。⁴

之后，莫斯科和东柏林便开始联手运作，解除乌布利希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职务。

在提交给1970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14次会议的一份内部报告中，昂纳克阐述了他对乌布利希经济政策的批评。⁵其中提到，再也无法保证经济“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乌布利希制定了太高的增长率，对电子数据处理一事的期望过高，用机器人启动了一种“浮华的计划”，总体上对重点部门的推动力度过大，造成重点部门供货短缺，结果是消费品供应不足，草率地忽视了住房建设。此外，乌布利希的政策还导致了对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欠西方债务，正中有意在民主德国立足的联邦德国的下怀，由此，民主德国在1970年被推向了灾难的边缘；但这一切并非党的过错；乌布利希依赖那些经过挑选的学者，而没有和党的委员会进行充分的商量。15年以后，昂纳克自己也推行了涉及重点部门的“浮华”计划，而且与1970年民主德国所欠的西方债务——20亿外汇马克（Valutamark）相比，⁶应由他负责的西方债务在1976年就已经翻了多倍。但当时他对乌布利希经济政策的批判，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完全赞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担心分权会产生的后果，而且也是因为昂纳克提出的改善消费品供应和促进民用住宅建设的要求尤其受到欢迎。面对1970年3月19日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与民主德国总理维利·斯多夫（Willi Stoph）在埃尔福特（Erfurt）会晤时民主德国民众爆发出的同胞情感，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感到震惊：成千上万的人冲破隔离带，对着勃兰特欢呼。他们明确表示，在西德总理身上看到了更为美好的德国。鉴于这些经验，统一社会党大多数领导人认定，昂纳克比以往更快地改善国民物质状况的目标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如何能够成功地得到本国国民的更多拥护？

不仅莫斯科的支持，而且昂纳克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路线也为他在错综复杂的博弈中能够成为乌布利希特的接班人奠定了基础。⁷

在1971年6月第八届党代会的协商会议上，党的新领导人昂纳克在讨论1971~1975年度的五年计划时所代表的路线，与他半年前接管权力时的文件如出一辙。党代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写道：

“主要任务……是在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发展、提高科技进步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国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⁸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武装下的党代会成员当然清楚，该决议意味着“回归苏联”，在斯大林 1952 年的文章《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中出现过类似字眼。⁹ 昂纳克在党代会上的发言中还增加了一些流行的观点。他谈到了居民消费品供应中的“缺陷和不稳定”，提出了未来几年将日益重要的环保问题，并且宣布了住房建设计划，到 1975 年为止，该计划会带来 50 万套新的或者翻新的住宅。昂纳克想方设法地遏制过高的期望。他说，只能逐步实现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要和总产值的增长相匹配，人们必须理智，必须提高效益，而且必须利用经济互助委员会（RGW）中国际劳动分工的优势。生活经验教导人们，“我们的社会消费从来不可能超过社会生产”。¹⁰ 尽管如此，对于民众来说，第八届党代会就像做出了一个许诺：经历了物质严重匮乏的建设岁月，现在该是收获的时候了。这种期望正在上升。

但是，在此期间重新集中的经济计划与调控体制，使这些期望几乎无法得到实现。重新集中意味着，计划委员会和各部委将重新集中地制定货币和商品经济的计划指标并分配到企业。借助 22 项以绝对值制定的计划指标、10 项以相对值制定的国家指标以及 15 项国民经济计算指标，工业商品生产、劳工数量、劳动生产率、工资基金、投资额度以及重要产品的生产数量和价值都由官方规定。在分权时期形成的“经济杠杆”中，只有生产基金支出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而企业净利润则以绝对值为指标加以规定。只有完成国家计划指标，才可以给奖金基金进行注资。再度集中的结果是，企业再也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动力去主动改变生产方式、在产品品种方面关注消费者的意愿，甚至开发新产品。反倒是为了得到尽可能“软的”、易完成的计划，将自己工作能力掩藏起来的企图有了明显的增长。¹¹

与重新集中相配套的是，在“计划和领导新经济体制”时期开始的价格改革被中断。从 1971 年起，再次出现了价格的普遍冻结。只有新产品或经过改进的产品才可以提价，企业必须就此提出申请，并经中央（通常由物价局）根据复杂的审核程序进行批准。新产品的价格制定程序又为创新设置了另一道障碍。

通过把国家参股企业以及工业和建筑行业中的小企业收为国有，完成了回归苏联模式的转型。昂纳克以工人们抱怨“资本主义部门”获取高额利润为理由，为国有化进行辩解。而实际上，恰恰是这些部门对改善消费

品供应做出了主要的贡献，从而得到过乌布利希的坚定容忍，对于这一点，党领导层却不再关心。自1972年以来，只有零售业和手工业部门中尚有少量的私有企业。

住房建设堪称昂纳克路线中“社会政策的核心部分”。每年建成的房屋数量，1963~1970年为7万套，1976年后提高到15万套，到1990年住房问题就应得到解决。其他社会政策措施是，1972年提高退休金和社会福利以及改善在职母亲的待遇。价格冻结也被视为社会政策措施：基本需求商品和服务价格保持低水平不变。

1976年5月的第九届党代会和1976年的党纲确认了昂纳克统称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路线。这不过是更为简洁地表述了1971年的方针，意思就是：一切照旧，应该将经济增长和个人生活方式置于紧密的相互关系中。扩大生产是增加工资和社会待遇的前提，工资和社会待遇的提高又有助于增强工作意愿，从而促进生产。

这种表述和原则听起来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而且在党代会上，党的领导人也很少做出超越1971年方案的具体许诺。而民众却希望党代会对新的社会政策做出承诺，因此他们的反应是失望的。

鉴于这种不满，昂纳克撤回了提高工资和社会待遇应与提高生产相协调这一条。在党代会召开一周以后，党领导便宣布上调最低工资和退休金。¹²

第一个警示信号

从1973年起，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区”（NSW）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1978年5月，许雷尔在专门送交给君特·米塔格（Günther Mittag）¹³和昂纳克的秘密报告中写道，1973~1977年，来自“非社会主义经济区”的进口为476亿外汇马克，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区”的出口只有329亿外汇马克。¹⁴结果当然是民主德国在西方银行的债务增加，1978年债务金额已达到84亿美元，几乎是民主德国向西方国家出口额的两倍。¹⁵（比较第49页）

民主德国对西方的贸易赤字有多重原因。对民主德国来说，对“非社会主义经济区”的出口越来越困难，这是因为受到从1974年开始的经济增长疲软的影响。而民主德国对“西方商品”的需求仍无止尽。政治局成员知道，国民是以能否买到咖啡和热带水果来评判经济政策的，因此需要

进口更多的此类产品。资本货物进口的增长尤其迅猛。昂纳克和米塔格作出一项冒险的战略决定：通过贷款在西部购买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因为他们寄希望于从西方进口设备而实现技术赶超，进而通过更高的出口额收益以偿还贷款。¹⁶对于具有较长产品生命周期的出口商品来说，这种战略也许能够奏效，1977年以来大力推进的借助日本的设备将苏联原油加工成“明亮”的产品，如汽油和柴油，就是最重要的例子。但是，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的商品而言，即便是注入西方的技术，也无法帮助那些遭受复杂调控体系阻碍的企业赶上西方企业的创新速度。此外，因为生产零部件的供应不灵，很多情况下无法有效地利用通过昂贵的外汇买进的机器设备。

在与西方的贸易中，两德间的贸易也占有特殊位置。70年代，在两德内部贸易中，民主德国也存在着贸易赤字，但不像与其他西方国家贸易中的赤字那么明显。这部分是因为欧共体在1957年3月25日《德意志内部贸易议定书》（*Protokoll über den innerdeutschen Handel*）中，¹⁷在联邦德国的敦促下，给予了民主德国优惠待遇。有关欧共体海关边境的规定不适用于从联邦德国进口的民主德国商品，因此，民主德国商品可以免税进入联邦德国，进入其他欧共体国家则不享受此待遇，但规定了联邦德国从民主德国进口商品的额度。税收减免是另一项优惠。从民主德国购买商品的西德公司可以享受商品价值11%或5.5%的增值税减免。在两德内部贸易中，如果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出口，民主德国得到的不是可以用来购买第三国商品的、可自由兑换的外汇，而是一种印有结算单位的信贷凭证，标为“外汇马克”。持有“外汇马克”可以在联邦德国购买货物，通常是以西德马克价格为基础进行结算。还有一种无息贷款，其额度自1975年起每年最高可达8.5亿西德马克，为联邦德国以及民主德国进行透支都提供了便利，得到了民主德国相当程度的利用。

如果民主德国没有从联邦德国日益增长的转移支付中得到实惠的话，包括两德内部贸易在内的西方贸易赤字可能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特别有好处的是那些用可兑换外汇进行的、不以民主德国经济回报为条件，或者不会对其产生后果的支付。昂纳克常称之为“不费劲的收入”¹⁸，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过境总支付，1972~1975年每年达2.349亿西德马克，1980年为4亿西德马克，后来每年为5.75亿西德马克。在由联邦德国出资、西德教会调解的赎买囚犯和家庭团聚（“教会交易B”，*Kirchengeschäfte B*）框架中的支付行为也意味着可观的减负，1971~1979